



军装,是供军人穿着的制式服装,是军人身份的重要标志,是部队形象的重要体现。军装不仅是军人生活的必需品,也是重要的装备物资,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2年初,时任红军学校校长的刘伯承让当时的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设计一套统一的红军校服。只因偶然间,刘伯承看到抽调来的学员着装五花八门,整理排面时十分混乱。于是他让赵品三亲自“操刀”,为学员们设计一套专属校服。

校服最初的样式是由小八角帽,开襟敞口的衣服组成,领子上有两枚红领章。后来,这身校服便成为中央苏区的统一军服:上衣为灰色中山装;军帽是八角帽,帽徽为红布五角星;军上衣是立翻领,4个带盖加扣的明兜,领口上缀一副红布领章;下装是有插手口袋的西装式军裤,绑脚腿。赵品三由此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军服的主持设计者。

后来的诸多影视作品及历史资料中,军服的颜色也一变再变。比如亮剑中的“李云龙”在抗日战争时期身上穿的衣服总是黑黢黢、油得发亮,可实际上沿用的还是深灰色调。

# 红军军服为何是灰蓝色？

陈毅“诗意”概括：代表天空、海洋、群山和辽阔的大地

## 第一批正规军装

### “一颗红星头上戴，二面红旗领子绣”

1928年5月,井冈山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成立。当时由于经济困难且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一直无法大量生产军装。

此时,就连红军指战员也只能穿着缴获的国民党士兵的军装和打土豪得到的衣服,虽然有改进,要么打补丁、要么改颜色,但着装却五花八门、各式各样。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从赣南进入闽西,解放长汀县城,取得了入闽第一仗的胜利。长汀,颇有传奇色彩,被称为“红军故乡”。1929年,第一套“红军制式军装”就是在这里诞生。

解放长汀城后,红四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没收了10余家反动豪绅财产约3万元,并向商人筹借了军饷2万元。

这笔“巨款”如何使用?考虑到当时红四军服装各式各样、形形色色,大部分战士的服装相当破旧,急需更换补充;同时为了便于行军作战和内部管理,红四军前委决定拿出一部分军饷,用来制作4000套军装。时任红四军军需处领导杨至成到处招收缝纫工人和个体裁缝,在长汀县城南门街郑屋建立了一个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临时红军被服厂(即后来的中华苏维埃被服厂),为红四军赶制统一的军装。

被服厂有了,但是市场上并没有现成的灰色布料,红四军军需处被服科的同志只好买来各式各样的布料,请人把布匹染成灰色,并参照当时苏联红军军服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初步设计出了具有红军特色的军服,并由毛泽东等人亲自审定了新军装的样式:上衣为中山装式,两个上贴口袋,领口缀红布领章;裤子为普通样式,配绑腿;军帽为八角形,缀红布五星帽徽。不过,这款军装只在红四军范围进行了初步的统一。

此时适逢列宁逝世5周年,为缅怀列宁的丰功伟绩,红四军前委决定将这批军装的红领章上都缀上黑边,以表纪念。这是红军史上唯一红领章上缀有黑边的军装。毛泽东曾指出:“红军军装领口上的两个红领章,代表两面红旗。”陈毅对军装的颜色作了很艺术化的说明:“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还有辽阔的大地。”

在工人不分昼夜的努力下,几天后,4000套崭新的军装发到了全军。从军长到士兵每人领到一套带红领章的灰蓝色军装、一顶带红五角星的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腿及两双胶鞋。这是红军第一次在一个军的范围内有了统一的军装。这套军装,既能够适应战斗需要,灰蓝色布质便于隐藏和自我保护,绑腿也让红军战士机动灵活,便于行军作战。“一颗红星头上戴,二面红旗领子绣。”从此,红四军战士穿着这套军装,开始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程。



50式军服。

# “长征第一书”的诞生

20世纪30年代,黎明书局曾于1938年1月1日出版了一本史诺著、汪衡译的《二万五千里长征》,30多年前,宁夏博物馆多年从事近现代革命史料和文物的征集研究工作的何新宇先生曾在其父亲的老部下家中看到过此书,但未及收藏而转到他人手上。几经周折,他才找到了这本书的新主人。

一位陕西西军旅收藏家在研究过程中,也得知黎明书局曾于1938年1月1日出版过这本《二万五千里长征》。为收藏到此书,也曾费尽心血。当他得知何新宇希望他能收藏此书时,他便专程赶赴银川,购得此书。后据媒体报道,这本《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终入藏于宁夏博物馆……

据考证,《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著者史诺就是埃德加·斯诺。译者汪衡1914年8月出生于北京,1993年1月去世,曾任原国家出版局版权处处长。1936年底至1937年,埃德加·斯诺把自己在陕甘宁边区所听所见写成多篇通讯,首先在英美报刊上发表。汪衡以斯诺分4期发表在美国亚细亚杂志上的《长征记》为主体而翻译编写了两本书,一本为《毛泽东自传》,一本为《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两本图书均由黎明书局发行。

## 关于版本的情况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32开竖排本,长18厘米、宽12.5厘米、厚0.4厘米,共67页。图书封面正中偏右为红色长方形底色,用白色楷书竖印书名,显得非常醒目。书名下方是一排前进着的红军队伍,与上方的五星被一段向西、再向北、再转向东的路线标识图相连接,寓意工农红军长征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封面的右上方竖印“史诺著·汪衡译”红色字,书的下方从右至左印有“文摘小丛书”“黎明书局经售”红色字。书的右上角用毛笔写着繁体字“刘裁铭”,下用蓝色长方印章盖“同学捐赠”,封面中间盖有蓝色菱形印章“贵阳市立贵阳中学校图书馆”,表明当时是一位叫刘裁铭的同学捐赠给学校的,扉页印有“1938.1.1初版”。封底为“红军长征路线图”,包括长征开始时间及所经地区等。目前,此版本国内仅存几本。从史料价值讲,历时多年,能在民间完整保存下来,实属不易。更珍贵的是,这本书是贵州省革命烈士刘裁铭的遗物,它的遗存也有纪念意义。

据2011年4月17日《重庆晚报》报道,重庆的一



红四军在长汀首次统一的全套军装,现珍藏于古田会议纪念馆。

## 电视剧《亮剑》里

### 李云龙的军服为何又成了深灰色？

在后来的影视作品中,虽进行了渲染,但基本还是还原了历史。比如,电视剧《亮剑》曾经一度被评价为较真实地还原八路军军政后抗战的历史,但实际上,距史实还是有一定差异。

看过《亮剑》的观众应该知道,在剧中,李云龙指挥的是八路军386旅独立团。抗日战争时期,李云龙的军服颜色为深灰色,到了40年代后期,军服则换成土黄色。其实按照当时情况,各路部队的军服颜色并不相同。比如,在东北和华北地区,部分军队已经开始使用土黄色军服,而西北地区的部队则使用深灰色。各支部队在军服颜色上不统一,因此随着局势变化,军队也开始正规化的建设。

虽然在军服统一上,八路军没有硬性规定,但由于1940年及之后的扩军,军服数量远远不够。当时八路军想到了两个办法:第一是自造,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带动下,八路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开展了轰轰烈

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那时候,一个被服厂假设能够生产几百件衣服,那就是几百个兵。八路军战士想到了一个办法,从稻草灰中提取灰色染料,从槐树籽、黄栀子、橡树壳等植物中提取土黄色染料,从烟墨、杨树皮中提取青色染料为服装染色,使得军服的颜色不统一,有灰色、蓝色、土黄色、黄绿色、蓝黑色、草灰色、青灰色等多种。

第二是拿别人的军服,俗称“张冠李戴”。那时,武器装备都无法拥有统一制式,军服能够人手一件已很不错了。因此,在影视作品中大家可能都看到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服被统一做成了德国灰色,这是为了节省成本。现实当中,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装却多是宽松肥大的夏装、厚重臃肿的冬装。

可以想见,电视剧中的李云龙能够凭借200套棉服,迅速到386旅独立团建立自己的团队,与其个人魅力不无关系。其实这200套棉服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就是200个兵,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加强连的兵力。

## “50式军服”

### 第一套全军统一制式、统一标准的军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建设时期,由原来的单一军种发展为陆海空三大军种。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亲自审定,1950年1月4日,中央军委批准实行新的军服样式,简称50式军服。

到1950年5月1日,我军换发了历史上第一套全军统一制式、统一标准的军服,这也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分级别、分军种、分用途装备的军服。它设置有夏服、冬服等,并首次装备大檐帽。官兵在夏服、冬服上衣左胸统一佩戴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胸标;各式

军帽均佩戴帽徽,式样为在镶有金黄色边的红五角星正中嵌金黄色“八一”字样。

这套军服1955年被55式军服取代,但直到1957年更换完毕,实际上使用了7年。

此后,从1950年统一军服制式以来,解放军军服先后进行了十几次调整改革。

透过不同时期军装的质地、颜色和款式,不仅可以品味出时代的审美,同时也反映出那个时代军事、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水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军装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据《华西都市报》)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壮举始于1934年10月,1936年10月胜利完成,从20世纪30年代(具体时间1936年8月以后)开始,便有描写长征的各种题材的图书陆续出现,较早的,国内出版的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被看作是“党内最早向外界介绍长征的第一书”;但由国外作者写作长征题材较早的图书,则当推埃德加·斯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且,在收藏界和图书文物研究中,一般把《二万五千里长征》,看作是“长征第一书”。

►现藏于宁夏博物馆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位资深藏书人曾从旧书摊里淘到过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认为,这本书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初版,是此书第一次在重庆发现。遗憾的是,这本书缺失了封面,扉页线框内上方印有“史诺著·汪衡译”,下方内套小线框内印有“1938.1.1出版”“黎明书局经售”等文字,装帧设计都比较简洁质朴,其内容与藏于宁夏博物馆的那本《二万五千里长征》版本内容相同,可以确信,此书是国内仅存的几本《二万五千里长征》之一,实属珍贵。

《二万五千里长征》初版10年后,1949年曾由文章出版社再次出版,书名仍为《二万五千里长征》,作者也是史诺(斯诺),但译者却是天明,该版本很少被人提及和关注。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发现,其版本的演变及内容的珍贵的史料价值,成为我们今天研究长征的第一手材料。这本书因为被发现的历史过程和被赋予的历史内容,已经超越了时间的界限,文本本身也成了历史的叙述者。

(据《人民政协报》)

## 陈布雷：向周恩来托孤

1947年2月底,国民党宣布国共和平谈判完全破裂。闻悉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即将离开南京后,一天傍晚,陈布雷叫上侍从副官,坐着小汽车辗转到达中共驻南京办事处所在地梅园新村。他让副官在楼下会客室坐着,自己径直去了楼上周恩来的办公室呆了两个多小时。和周恩来下楼后,两人又走到楼前花园左角继续谈了约半小时。临别时,两人紧紧握手,周恩来告诉他:“你的事我去办,你放心。”

在回去的路上,陈布雷告诉惊疑无比的副官此行是为私而非为公。原来,陈布雷是为儿子、女儿、女婿的私事,希望周恩来对他们多加照顾,是来向周恩来“托孤”的。

陈布雷讨厌内战,希望饱受抗战之苦的百姓能休养生息,曾多次建议蒋介石罢兵议和,但并无结果。在绝望之余,他选择了“尸谏”,于1948年11月服用大剂量安眠药自尽,幻想用自己的生命来唤起蒋介石对内战的反省。

(据《天津日报》)

## 詹天佑维护农家田

1905年10月,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开始动工,1909年9月通车,后又延长到大同、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的一条自建国有铁路。

詹天佑在勘测选线时,很注意保护农田和水利工程,千方百计地少占用农田,尽量不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因修建铁路而蒙受损失。当勘测到怀来县新保安一带时,看到城前是一片广阔的稻田,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当地农民修筑的惠民渠纵横交错,灌溉着大片的良田,若将此地占用,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于是他重新勘测,把线路改选在从城墙后面的一座小山包的脚下绕过,虽说这要使铁路爬坡,但却避免了占用良田和切断水渠,从而保护了当地的农业生产。

京张铁路动工后,詹天佑也处处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当铁路要从农田穿过时,他看到地里长着嫩绿的庄稼,认为如果马上动工,势必毁坏大片青苗,这对农民显然不利,于是就把这一段的工期推迟,待秋后收完庄稼再进行。

詹天佑维护农民的利益,关心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成为一段佳话。

(据《人民政协报》)

## 蔡京：被百姓反贪饿死的宰相

公元1125年,大金铁骑向南驰骋,直逼京都开封,北宋江山一触即溃。公元1126年,赵桓即位。由于蔡京之贪名扬全国,又有多人举报,宋钦宗为顺应民意,向蔡京问罪处罚,把他判了个“死缓”,发配到岭南韶关,但是,并未没收其财产。

被判刑之后,蔡京选择水路向南流亡。沿途百姓目睹一艘船只满载着这个著名贪官的金银财物以及妻与妾,愤恨不已。于是,百姓自觉形成了北宋体制外的民间反贪联盟。当时,从开封到长沙大约3000里,沿途没一家旅馆接纳蔡京一行。白案红案的餐馆,一听说蔡京来了,宁可小吃大餐慢了,也不卖给他。大小商铺见蔡京一行“光临”,谁都不卖给他任何东西。

蔡京趾高气扬地开高价,但百姓穷得有骨气,嫌他的钱脏了手,就是不要。3000里路上的百姓如出一辙,蔡京沿途没买到一口饭、一盘菜、一杯水,风餐露宿,饥寒交迫。不久,北宋晚期一个权势遮天的宰相病饿致死了。

(据《天津日报》)

## 苏轼“房梁挂钱”曾国藩也效仿他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北宋时期的文学家、美食家苏轼,曾自称“聚物之天美,以养吾之老饕”,其实他在饮食上十分节俭。

在《节饮食说》中,苏轼给自己定下规矩,“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其中大意是,苏轼平时吃饭,不过一荤一酒;自己请客或别人请吃饭,也不能超过三个肉菜,否则就不赴宴。苏轼如此,绝非造作,其用意是:“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这等节俭,自是修养功夫。

后来,苏轼被贬黄州,他不但自己亲自耕种,还实行计划开支,这就是后来曾国藩都为之效仿的“房梁挂钱”。据说,苏轼把钱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三十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分好的钱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取下一小份,作为当日的生活开支,如有结余,就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

(据《厦门晚报》)

## 成语“纨绔子弟”其实与裤子有关

成语“纨绔子弟”中的“纨”字最初写作“袴”或“裤”,后来才写成了绞丝旁的“纨”。

《汉书·叙传》上讲到一个叫班伯的人,这个人“出与王、许子弟为群,在于绮襦纨裤之间,非其好也”。班伯经常跟王、许两位皇后家里的子弟们一起玩,这些子弟们穿的都是绮襦纨裤。这是“纨绔”一词的前身。

早期的袴穿在里面,外面有裳遮挡,所以往往用低档面料制作。后来在汉朝的文景之治和丝绸之路畅通的环境下,富人消费丝绸不再是大问题,所以逐渐演变为“纨绔”,暗示用料的讲究。

(据《厦门晚报》)